



批评也是生产力

(2006-3-16 10:46:01)

作者：毕诗成 转载于：北京青年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14日上午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是人民的儿子。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归功于人民。”当有记者问温总理主政以来最感动的是何时，温总理说，“我最感动的是人民对政府的支持。这种支持来自鼓励，也来自批评，而且总是那么热情、一贯。”

如何看待来自民众的批评，历来是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闻过则喜”是“亚圣”孟子留下的古训；“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则为孔圣人指出的“闻过”之后的动作选择。依孔孟儒学治国的中国古代文化，本该形成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良好社会氛围，但遗憾的是，历代封建王朝都是将神权与王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皇帝的话不存在犯错误的问题。在如此认识之下，民众对于政府的批评，显然是“违背天理”。尽管汉武帝、唐太宗等都下过罪己诏，认过错，算是自我批评吧，但那只是做个姿态而已。中国古代大多数情况下是“官民对立”甚至“防民如防川”的时代。

如此“防民”思维的流毒，使得人民当家作主后的人民政权里的好多官员常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一些官员总以为官职就是权威，批评会削弱权威。孟“亚圣”曾告诫我们“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虽然说的是古代君臣之道，实际上也同样适用于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当一些官员认为说好话、歌功颂德才是“支持政府工作”，说坏话、挑毛病就是“给政府添乱、找茬儿”的时候，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就会陷入僵局，形成互不信任的对立局面。

记得上世纪50年代，一位在韩国居住了26年的日本人写了一本题为《准备被人打死而写的对韩国和韩国人的批判》的书。书中专门收集了韩国的坏事，骂得淋漓酣畅，骂得辛辣无情。韩国人并没有将其简单视为“恶意的攻击”，而是从中汲取智慧，化成大步发展经济、实现社会转型的动力。后来，国际社会几乎都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不怕骂的国家是有前途的国家；一个不怕骂的官员是有气度的官员；一个不怕骂的人是有责任心的人。

我们要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展经济，让13亿人口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就不仅需要有信心、有决心，还需要少走弯路。而不走弯路的最大捷径就是保持清醒头脑，吸收民众的智慧，调动13亿人的聪明才智保道路的“最优化”。在现代社会，政府需要创造一个政治过程，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意志，当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能是靠不断扩大的大众民主。韦伯断言，现代国家的强盛，必然是以大众民主为政治基础，延展而来；大众民主的盛行，必然以大众政治参与得到满足为基础，必然以民众的批评之声得到妥善而积极的回应为基础。

当前大家很关注官员腐败的问题。笔者以为，官员腐败固然危及政治的稳定，但比腐败更可怕的是官员对民众的冷漠，是让民众没有认同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一个千百万人协同运作的政府，有些问题更是在所难免。孔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让老百姓做什么，但不能告诉老百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典型的“治民”思想，已经为主张“民治”的现代人所诟病。康有为改句读为“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老百姓的觉悟和认识提高了，就放手让他们去做；如果老百姓觉悟还不够，就教育他们使他们明白为什么要做和怎样去做），一下子将孔子民主化了。我们今天的人民政府完全有条件更进一步：对于来自人民的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一定意义上讲，正确对待各种渠道反映出来的批评意见，让政府在执政过程中尽可能做到走对路、不走弯路、少走弯路，最大限度地节约执政成本。唯有如此，批评才不是政府的障碍，而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生产力。

[\[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国际儒学联合会 Copyright©2003-2007